

旧版文章

天人古今

- 古今通论
- 古代通论
- 世界史论
- 当代三农
- 现实问题
- 旁通类鉴

先秦史论

- 先秦通论
- 原始经济
- 文明起源
- 夏商西周
- 春秋战国

汉唐史论

- 汉唐通论
- 战国秦汉
- 秦朝秦代
- 西汉东汉
- 魏晋南北朝
- 隋唐五代

宋元史论

- 宋元通论
- 唐宋通论
- 北宋南宋
- 辽金西夏
- 蒙元史论

明清史论

- 明清通论
- 明代通论
- 明中后期
- 清代通论
- 清代前期

近代史论

- 近代通论
- 清代晚期
- 民国通论
- 民国初年
- 国民政府
- 红色区域

现代史论

- 近世通论
- 现代通论
- 前十七年
- 文革时期
- 改革开放

学科春秋

- 学科发展
- 专题述评

国学网 - - 中国经济史论坛 / 近代史论 / 近代通论 / 综论、民族、区域 / 近代广东商人与西南边疆农家经济的变迁

近代广东商人与西南边疆农家经济的变迁

2007-04-23 陈岗 中国农史2007.1 点击: 385

近代广东商人与西南边疆农家经济的变迁

近代广东商人与西南边疆农家经济的变迁

— 以广西苍梧戎圩为个案研究

陈岗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四川成都610064)

中国农史2007.1

[摘要]近代前后,广东商业移民是推动广西等西南边疆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变迁的重要力量。本文依据方志、年鉴等方面的资料,以苍梧戎圩为个案,追踪考察近代广东商人的商贸活动对地处西南边陲的广西农家经济变迁之深刻影响。

[关键词]近代;广东商人;西南边疆;农家经济;变迁;戎圩

[中图分类号]S-09; 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07)01—0050—08

[收稿日期]2006—02—18

[作者简介]陈岗(1966—),男,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4级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经济史。

The Guangdong Businessmen and the Vicissitude of Farmhouse Economy
in the Southwest Frontier in the Modern Time
a case study on Rongxu Cangwu Guangxi
CHEN Gang

(School of History&Culture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Abstract: In the modern time, Guangdong businessmen were an important force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in the southwest frontier as Guangxi etc. As a case study on Rongxu Cangwu Guangxi, the text pursues to review the profound influence the Guangdong businessmen activity to vicissitude of the farmhouse economy Guangxi in the southwest frontier.

Key words: the modern time; Guangdong businessmen; the southwest frontier; farmhouse economy; vicissitude; Rongxu

一、导言:研究的缘起

近代前后,沿海、沿江地区商业移民的内迁,对中国西南边疆社会经济开发具有重要的作用。以此为主题,研究者从不同侧面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探讨,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然而,纵观诸多论著,论者多以宏观或中观的视角,对商业移民与西南边疆社会经济开发作总论式的探讨;①而以某个具体地域为参考系,追踪考察商业移民对西南边疆社会经济层面性变迁的微观个案研究则明显缺失。非但如此,农家经济的现代化转型仍为当今西南边疆地区社会经济现代化的重点和难点所在,也是广西、云南等西南边疆省区政治、经济生活的重大主题。以此而论,本文的研究

既有较大的学术价值，又具突出的现实意义。

①相关研究成果如，方铁：《西南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罗群：《近代云南商人与商业资本》，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董孟雄：《云南近代地方经济史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刘云明：《清代云南市场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刘云明：《试析清代商人的群体整合》，载《思想战线》1996年第2期；刘云明：《清代云南境内的商贾》，载《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钟文典：《广西近代圩镇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黄滨：《近代粤港客商与广西城镇经济发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陈炜：《近代广西境内的商贾》，载《贵州文史丛刊》2003年第4期，等。

本文所说的苍梧县戎圩，为近代前后广西著名的圩镇，“其地面临大江，左右高山环峙，峰连翠叠，数十里而不绝。上接两江：一自南宁而下。一自柳州而下，皆会于戎。水至此流而不驶，故为货贿之所聚云。”明朝中叶，戎圩已逐步成为重要商埠，大西南的主要物资经这里集散，借道西江航运转运广州、香港。清康熙以后，戎圩商贸呈现鼎盛之势，位居桂东南三大名镇之首，有“一戎二乌（今平南大安镇）三江口（今桂平江口镇）”之说，成为广西最繁荣的商业市镇之一，“虽通道大都，广于雄镇，未足比也。”^①是时，来自广东高州、罗定、信宜、鹤山、雷州、南海、佛山、广州等地的广东商人云集戎圩经商，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广东商人更原有之夫子祠为会馆，是为广西创建时间较早的粤东会馆。戎圩建立粤东会馆后，吸聚了更多的广东商人进驻戎圩经商，至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重建粤东会馆，建馆题名者约计1600余家（人）。^②广东商人以戎圩粤东会馆为依托，“货于市者，禅镇扬帆，往返才数日。善虽客省，东人视之，不啻桑梓矣”，^③其本土化发展迅速推进。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重建粤东会馆碑记上有标明商号经营地点的广东商人有400家，其中已落籍广西的广东商人即近300家，分布于除泗城府以外的广西所有州县。^④“会馆成，我东人岁时习礼其中，展恭敬情，序乡邻之谊，戎愈以增重也”。^⑤众多广东商人的到来，进一步繁荣了戎圩的商业经济，戎圩的经济地位不断得到抬升。清道光、咸丰年间，广西的土特产品多以戎圩为集散地，形成豆行、布尺、银号、皮货、杂货、药材、烟丝、磨坊、铜器等16种行业，以居间贸易代客买卖商品为主的平码行业（俗称经纪行）也在戎圩形成。清咸丰四年（1854年）以后，戎圩商业向梧州转移而有所衰落，但仍比较活跃，仍为广西最为繁荣的商业市镇之一。戎圩在两广商业贸易交往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为我们深入考察广东商人与地处西南边陲的广西的农家经济变迁提供了一个绝好的透视点。换言之，戎圩广东商人与其周边地区农家经济的关系也正是近代广东商人与广西农家经济关系的缩影，此也即为本文选取戎圩为透析近代广东商人与西南边疆农家经济、乃至社会经济变迁的视点之意义所在。

二、近代广东商人与戎圩周边地区农家经济的变迁

近代前后，戎圩最大宗的出口商品是谷米。在道光 and 咸丰初年它是广西最大的谷米集散地。直到20世纪初，谷米仍然是该圩最大宗交易商品，广东罗定、都城、德庆、肇庆每日有大批商人来戎圩采购，日成交额约20万至30万斤。[1]（p19）清代民国时期，戎圩成为广东商人贩运粮食的基地，是“西米东流”的最大中转站，是以时人曰：“国家重农务本，户口殷繁，而西省田畴广美，人民勤动性成，中岁谷人辄有余，转输络绎于戎，为东省赖。故客于戎者，四方接鞞莫盛于广人；集于戎者，百货连樯，而莫多于稻子。凡两粤相资，此为重地。”^⑥谷米主要来源于戎圩附近长行乡，多以肩挑运来，每日有7万至13万斤；水路从

①苍梧县志编纂委员会：《苍梧县志》，《附录·重要碑刻·重建粤东会馆记》，广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

②温汝适：乾隆五十三年（1788）《重建粤东会馆题名碑记》，拓片现存广西师范大学广西地方民族史研究所。

③苍梧县志编纂委员会：《苍梧县志》，《附录·重要碑刻·重建粤东会馆记》，广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

理论方法

史观史法
历史理论
领域视野
方法手段
规范学风

史料索引

古今文献
考古文物
简帛文书
回忆追述
社会调查
论著索引

论著评介

通论文集
古代史著
明清史著
近代史著
现代史著

动态信息

期刊集刊
网站网刊
团体机构
学术会议
研究动向

他山之石

世坛综考
美国史坛
西欧史坛
东亚史坛
其他地区

池月山云

文史随笔
知识小品
诗词诗话
文艺点评
小说演义
史眼世心

④温汝适：乾隆五十三年(1788)《重建粤东会馆题名碑记》，拓片现存广西师范大学广西地方民族史研究所。

⑤苍梧县志编纂委员会：《苍梧县志》，《附录·重要碑刻·重建粤东会馆记》，广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

⑥苍梧县志编纂委员会：《苍梧县志》，《附录·重要碑刻·重建粤东会馆记》，广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

平南、藤县、丹竹、武林上河各埠，每日有12万斤至18万斤进戎圩。①其次是家禽牲口、柴炭等。当时此类商号最大者是冯洪记、黄大亨、罗亚银3家，拥有资本约白银2—3万两。第三是百货布匹行业和杂货行业，苏杭百货就有10多家，杂货店12家，货源多来自广州、佛山、江门，主要销往平南、桂平、贵县、昭平等地。此外还有药材业、面条加工业、制鞋、陶瓷、医药业。酿酒业有3家，日产酒2000—3000斤，染布业2家，旅宿业4家，典当业6家，②各行商店亦多为广东商人开设。从上述谷米的来源以及苏杭杂货行销的地域范围来看，受戎圩广东商人影响的农家经济，就区域而言，至少涵盖整个桂东南地区。概而观之，在广东商人的影响下，戎圩周边地区的农家经济发生了如下变化：

第一，大批广东商人以粤东会馆为依托，进驻戎圩及其周边地区，将广西所产之稻米大批量运销广东，促使商品化成为推动桂东南稻米生产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

清朝民国时期，戎圩在相当长时期内是西米东流最大的中转市场，来自珠江三角洲等地的广东商人大批量地收购运抵戎圩的稻谷，然后经由戎圩贩运回广州、佛山、西南、勒留一带批发出售，故佛山等地有“出不尽戎圩谷”的民谚。据不完全统计，清代粤商每年从广西贩运回广东的粮食不下180万石，[2] (p258) 民国四年(1915)，桂米由梧、贺销粤之数则达四百万担以上。③广西谷米销粤有着巨大的利润。如光绪三十年(1904)，戎圩最大的谷米商号联兴号，每日谷米交易常达十万、八万斤，年盈利达白银一万数千多两。[3] (p180-190) 种植稻谷的利润也因市场需求量巨大而变得有利可图。因此，清代以后，桂东南各县稻作生产在市场利润的驱使下获得了较大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种植面积迅速扩大。垦植荒地是扩大稻作面积最主要的途径。垦荒虽说带有很强烈的政治统治需要，也与人口的扩张有很大的关系，但是不排除有农业商品化的因素在起作用。据谢启昆《广西通志》记载，清中期广西大部分府县都增加了新开垦的耕地。广西总耕地面积，从顺治十八年(1661)的539万亩，到康熙二十四年(1685)增至780万亩，增加了241万亩，④24年时间增长了近50%。而梧州府，“自雍正十三年至乾隆二十五年编征新垦升科田一十九顷八十一亩六分二厘”。⑤郁林府，自雍正十三年(1735)至嘉庆三年(1798)编征新垦升科田215顷65亩。⑥民国二十三年(1934)，“据广西省政府统计局之调查，广西耕地面积，为二千九百余万亩，其中水田一千九百余万亩，约占耕地面积百分之六十四。水田中，除极少数栽种芥及芋等蔬菜外，几为稻田。由此可见稻作在广西农作中之地位。”⑦

①苍梧县志编纂委员会：《苍梧县志·商贸·商业》，广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

②苍梧县志编纂委员会：《苍梧县志·商贸·商业》，广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

③侯雅云：《清末苍梧戎圩商品市场史料》，载梧州市地方志办公室编《梧州史志·经济资料选辑》(内部资料)，1986年4月。

④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西通志·土地志·土地开发》，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

⑤谢启昆、胡虔：清嘉庆《广西通志》卷157，清光绪十七年(1891)桂垣书局补刻本。

⑥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西通志·土地志·土地开发》，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

⑦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西通志·土地志·土地开发》，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

其二，耕作生产技术有所进步。明代以前，桂东南地区农业生产总体仍处于粗放经营的状态。清代以后，耕作方法有进一步改进。民国《桂平县志》记载当地稻田耕作的环节有6个之多，即：“曰犁晒、曰翻稿、曰耙劳、曰抄田、曰耙播、曰耘田。

犁晒者，晚造既毕，为来岁绸缪，天雨田湿，则以犁翻土，令草秆根蒂出田而吸受风日，枯碎成泥，田则饶肥也。翻稿者六七月间早造既登，犁起田泥，辗以梭轴，令秆与泥融合水中，以便晚造稻种也。耙劳者，耙碎犁晒时翻起的巨块，令受水渍也，于正月雨水前后行之... 耖田者，因耙劳后巨泥粉碎，受渍成糜水，乾复实，乃耖松之。耙播者，耖后再耙，令松起者复归于平，亦即耙荔之类... 经此耙后，即可播田，故曰耙播。耘田者，秧长后以一足蹴平，秧旁杂草一足独立，挟之以杖，就后以《论语》所谓植杖而耘也。”^①

其三，注重水稻优良品种的推广。近代时期，广西各地十分重视水稻良种的引种，并注意根据不同水稻的特性选择不同的种植环境，桂东南这方面的努力尤为突出。据清光绪十七年(1891)《郁林州志》记载，当地一种名为“宾州红”的红壳谷引自贵州，另一种名为“广东红”的品种引自广东。^②民国《陆川县志》载，该县有一种名为“翻冬粘”的水稻品种，“质系早稻，共传种之法：须于晚稻播少许，将所获谷留作次年种子。”^③清乾隆四年《岑溪县志》说：“早稻，亦粳，糯各种，宜植于山”。^④20世纪30年代，广西地方政府采取了许多增产措施，推广水稻良种就是其中之一。1931年，设于桂平的水稻试验分场将试验与推广优良品种结合起来。^⑤广西地方局的努力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水稻、小麦增产与良种推广，扩大栽培面积颇有成效。”^⑥桂东南的藤县等地，“糯稻亦有过半数农家种植之。”^⑦

其四，稻谷的产量有所增加。桂东南地区水稻产量长期以来位居广西各地区之首。时人曰：“水稻栽培虽遍于全省，然就产量而言，则以东南部浔江流域为最多。”^⑧

县(市)别	1937年	1938年	1939年
苍梧	2 658 945	2 787 554	2 823 007
贵县	1 564 989	1 901 663	2 301 600
桂平	3 325 635	2 620 987	3 280 891

资料来源:广西统计局、广西省政府统计处:《广西年鉴》第三回,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第286、287页。

从上表可看出,20世纪30年代末,除了个别年份产量有所下降外,桂东南一些重要的农业大县,水稻产量总体呈增长的趋势。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多方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但水稻增产的动力,从根本上说来自于广东商人贩运谷米导致水稻生产商品化所带来的巨大市场需求。因为,广西所产的稻谷,除了本地消费之外,更多的是进入广东等市场流通而成为商品。

第二,广东商人的商业资本进入农村金融流通领域转化为高利贷资本,导致农民入不敷出,产出与消费的比例严重失调,乡村借贷盛行。

广西地租率十分高昂,“各种佃租之租额,纷歧繁杂,分租多为对分,粮租亦约折合收获物之五成左右,钱租则约为地价之一成至二成,亦有少数地方超过二成以上者,凡此均与全国各地之租率同其苛重,无足深异”。^⑨桂东南地区盛行实物租,多收取稻米。由于稻米商品化程度高,所以租率相对也较高。“租种一亩田收租谷由二百斤至二百五十斤,也有收到三百斤的。总之每年田租要交收获稻谷一半以上。”^[1](p13)高于百分之五十的广西和全国平均数。农民收入甚微,有的地方“三年之耕,恒不足供两年之食;甚或一年之耕,不能酬一春之种。”^⑩新修《苍梧县志》对解放前县境农民生活状况是这样描述的:“解放前,

①程大璋等:民国《桂平县志》卷5《食货》,民国九年(1920)粤东编译公司铅印本。

②文德馨等:光绪《玉林州志》卷11《物产》,清光绪二十年(1894)刻本。

③吕浚坤等:民国《陆川县志》卷4《物产》,民国十三年(1924)刻本。

④何梦瑶等:乾隆《岑溪县志》卷2《食货》,清乾隆九年(1744)刻本。

⑤《广西建设汇刊》第一期《农业建设概述》,广西省政府建设厅1937年8月编印。

⑥广西统计局、广西省政府统计处:《广西年鉴》第三回,民国三十三年(1944),第272页。

⑦千家驹等:《广西省经济概况》,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36页。

⑧张先辰：《广西经济地理》，桂林文化供应社民国三十年(1941)，第35页。

⑨千家驹等：《广西省经济概况》，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3页。

⑩程大璋等纂：民国《桂平县志》卷29《赋税》，民国九年(1920)铅印本。

县内农民80%很难维持温饱。一般年景，部分农户能维持2餐粥1餐饭，大部分农产只能是3餐粥，大米不够还要拌以木薯、红薯、芋头等杂粮。”^①又据民国24年(1935)《广西年鉴》记载，民国二十三年(1934)，苍梧县农民常年保持每日有一餐饭以上的占38%，常年没有饭食，只能食粥的占30%，常年食粥加粗粮的25%，常年均以杂粮充饥的占7%。^②农民人不敷出现象十分普遍。

表 2 广西玉林县平均每农家周年收支盈亏之比较 (单位:国币)

	自耕农 16 家	自耕农兼佃农 27 家	佃家 26 家	佃农兼雇农 7 家	总计 67 家
周年收入总计	410.43	350.06	286.91	205.54	327.85
农场支出	116.44	149.66	141.51	74.45	132.89
家庭消费	251.31	205.69	177.12	141.07	199.78
周年总支出	367.75	355.35	318.63	215.52	332.67
盈亏	+42.68	-5.29	-31.72	-9.98	-4.82

资料来源:千家驹等:《广西省经济概况》,商务印书馆 1936 年,第 62 页。

另据20世纪30年代对广西12县780农家的调查分析,“平均结果计周年收入总数为293.90元,支出总数324.79元,结算收支相抵,计不敷30.89元。”^③农民产出与消费不但比例失调,而且日常生活消费结构也很不合理。就12县780农家分析,“平均每家之周年家庭消费值计227.59元,约当周年农场支出之三倍。总值内156.55元用于食品,当消费总值之68.8%,8.94元用于衣服,36.78元用于燃料,当总值之16.2%,此外25.31元为杂项消费,计占之11.1%”。^④国际经济学界在研究和衡量一种消费结构时,普遍以恩格尔系数为重要指标。广西12县780家农户每年家庭消费值227.59元中,占比重最大的是食品费用,共156.55元,平均每家的恩格尔系数为68.8%,高于同期冀、豫、晋、皖(北部)四省的恩格尔系数62%。^⑤因此,上述12县780农家的消费水平属于绝对贫困型,农家“以即终年月并抵足,仍不得图一温饱。”^⑥为生计所迫,农民不得不借债度日,地主、商人乘人之危,大放谷花和典当。一般债息,四月借一石,六月还二石。“道光年间,戎圩的当铺有元吉、公倍、恒益之间。月息三分,多是广东人开的。”[1](p24)“广东人会做生意,在荒年或青黄不接时,他们借钱给农民,到收割时便按时价谷米,用黄豆、猪、牛偿还也可以。农民向他们借谷米,借一石还一石五斗,到秋收时还,则要一石七斗。”[1](p19)而“预卖作物,为高利贷之最通行者,通常多在收获先一二月行之。预卖之价值有种种不同之规定。”^⑦“如梧州之戎圩,每当秋收后即有谷米收屯庄在该处收买谷米,多者收至三四千担,少亦千余担,商人故意将谷价压低,农民以负债累累,不得不忍痛脱售,此时收买市价,多为每担四五元,待至次年春荒时,谷价则涨至八九元,相差计及一倍。农民赍贱谷吃贵米之呼声,几为全省贫农一致之现象,此又高利贷资本与商人资本勾结以榨取农民之一例也。”^⑧因此,农民辛苦一年,却无法摆脱“卖粮还债一借债买粮的恶性循环”。^⑨一般而言,商品经济本因产品剩余、富裕而交换和发展,而戎圩周边农村地区的商品交换不完全是这样,在许多情况下恰好相反:农民是因为极端贫困,为解救眼前危机而被迫走向市场,而市场给予他们的则是更大的危机与贫困。市场对于农民而言,并非谋求利润,积累个人财富,扩大再生产的媒介,而是恶性循环的经济生活中的重要环节。所以,有学者认为,貌似繁荣的市镇商品经济与贫穷的“糊口农业”并存,是中国经济史上独特的一幕,明清以来尤为明显,进入20世纪也未有根本的改观。[4](p243)

①苍梧县志编纂委员会：《苍梧县志·商贸·商业》，广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

②广西统计局、广西省政府统计处：《广西年鉴》第二回。民国二十四年(1935)编印，第156页。

③张先辰：《广西经济地理》，民国三十年(1941)桂林文化供应社印行，第35页。

④张先辰：《广西经济地理》，民国三十年(1941)桂林文化供应社印行，第35

页。

- ⑤J. L. Buck Chinese Farm Economy. P386 Chicago, 1930.
- ⑥千家驹等：《广西省经济概况》，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81页。
- ⑦千家驹等：《广西省经济概况》，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81页。
- ⑧千家驹等：《广西省经济概况》，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3页。
- ⑨千家驹等：《广西省经济概况》，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83页。

第三，广东商人大规模的贩运贸易引发了戎圩周边乡村地区农业生产领域扩大，乡村工副业畸形发展。

如上文所述，清朝民国时期，戎圩最大宗的出口商品是谷米，其次是家禽牲口、柴炭等，此外还有百货布匹行业、杂货行业、药材业、面条加工业、制鞋、陶器业、医药、酿酒等行业。这些行业的形成发展对周边地区农家经济的生产有着市场导向的作用。除稻作继续为农业主导产业外，乡村工业、副业也畸形发展起来，使农业生产的领域有所扩大。分述如下：

面粉加工业 苍梧戎圩远在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就有了面条加工业。在道光、咸丰年间，戎圩较大的面条加工作坊有十多间，大部分是广东省人经营，也有本地人经营的，也有广东人与本地人合营的。最大的每间有十五、六个工人，小的也有四、五个工人，全是手工操作，一个磨面子，一人打面，每日每人磨麦子60斤，打面粉42斤，制造出面条45斤。工人大多是附近农村的农民，小部分是圩镇的居民。工资是按日计的，开工有工资，不开工老板只给吃，不给工资。戎圩面条业所用的麦子从桂林、全州、阳朔和柳州运来，面条则运销百色、南宁、桂北一带及广州。“戎圩面条质量很好，各地很欢迎。戎圩面条加工业最盛是光绪末年到民国十年，曾经发展到一百二十间。”[1] (p37)

养殖业 戎圩周边地区是桂东南鸡、猪、牛等家禽牲口的集散地之一。新修《苍梧县志》记载，清末民初，夏郢有牛圩等。另据戎圩当地老人的介绍，“戎圩的牲口家禽生意很兴旺，每日上市的猪有几百头，鸡、鸭、鹅有几百笼(每笼有200只)。这些畜禽都是销往广东的”。[1] (p38)

县别	水牛	黄牛	马	羊	猪	鸡	鸭	鹅
苍梧	1100.00	810.0	—	40.0	404.0	14.2	11.9	11.4
广西平均数	1082.7	700.6	706.0	62.9	341.0	11.4	9.2	16.9

资料来源:广西统计局、广西省政府统计处:《广西年鉴》第三回,民国三十三年(1944),第551页。

由表3可知，苍梧县农户饲养的家禽牲畜，其价格大多高于同期广西的平均数，这是广东商人长期以戎圩(梧州)为基地，大批向广东运销家禽牲口的结果。禽畜养殖业的高度商品化使之成为农家副业生产的主要行业，这种情况在整个桂东南地区尤为突出。据民国33年(1944)《广西年鉴》记载：“本省牛只... 其分布于浔江、郁江两流域为最多。养猪民家遍布各地，其重要区域为西江流域一带。养牲不甚普遍，以分布苍梧一带为最多。”①

山林副业 柴炭是其中一个较为重要的行业。桂东南地区的柴炭多以戎圩(梧州)为中转站，运销广东市场。“梧州的柴炭行业历史较早，一百多年前，惠州人到梧州经营柴炭，此时梧州就有了柴炭业的经纪行，梧州每年运出的柴有一千几百万斤，炭较少，由销广州、江门等埠，外销香港、澳门... 梧州柴炭来源有三路：一路来自北流河的北流，藤县、容县、岑溪等地；一路来自抚河的昭平、苍梧等地；一路来自蒙江、苍梧等地。”[1] (p29)其中，苍梧县自清朝康熙、乾隆年间到民国初年是柴炭出口基地，薪炭林资源丰富。薪炭林主要分布在旺甫、六堡、梨埠、木双等乡镇。解放前，县内农民就有生产木炭和土法烧制木炭的习惯，②经济林木种植是苍梧县山林副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六堡茶在清嘉庆年间就以其特殊的槟榔味而人中国名茶之列，“畅销穗佛港等埠。六堡茶当收成时，粤省茶商在合口圩设庄收

①广西统计局、广西省政府统计处：《广西年鉴》第三回，民国三十三年(1944)，第535页。

②苍梧县志编纂委员会：《苍梧县志·林业·林副产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

买，再烹炼制成茶饼，甚为精致，熬而饮之，味与普洱茶同，年产约五十余万斤。”^①荔枝、玉桂、八角等也为苍梧县有名的林副产品。

因此，乡村副业是农民重要的职业，参见表4：

表 4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苍梧县从事各种副业之农家占总农家之百分比兼营副业农家从事副业之月数

类别		百分比	月数
树艺类	蔬菜	45.0	4.9
	树木	30.0	1.0
	果树	10.0	0.5
	特产	—	—
养殖类	养蚕	30.0	6.0
	养蜂	—	—
	养鱼	35.0	12.0
	养猪	63.3	9.0
	养鸡鸭	70.0	9.1
手工艺类	纺纱织布	—	—
	编草鞋绳	—	—
	编筛筐	—	—
	做土砖	5.6	2.7
帮工类	帮工	—	—
	割柴草	—	—
其他职业	小商贩	6.7	6.7
	木匠	16.5	3.4
	裁缝	—	5.3

资料来源：广西统计局、广西省政府统计处，《广西年鉴》第三回，民国三十三年（1944），第392、399页。

从表4可看出，苍梧县农民所从事的副业中，仍以树艺业和养殖业为主，但乡村工副业不可能、事实上也没有离开农业，它是农耕世界的补充，更是农耕世界的延伸。是以，上文称之为“农业生产领域的扩大”。

三、结语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可得出以下历史逻辑：广西地处西南边陲，近代前后城市化水平很低。多数州府所在地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只是一些较大的市镇。因此，溯西江而西进的广东商人在广西各州县城的经营活动，都可视为在农村市镇上的发展。而市镇是城市与农村联系的纽带，是农村商业活动的中心，也是农村社区的中心。近代广东商人又多以市镇为基地，收购农村地区的农副土特产品；而又以市镇为中转站，向农村运销日用杂货等商品。因此，广东商人一经在集镇上建立经营基地，其经营活动必不可避免要与农家经济产生各种各样的联系，对农家经济的变迁产生影响。对戎圩的个案研究表明，近代广东商人的商贸活动形成了巨大的商业化推力，促动了贸迁地区农家经济结构和农民生产、生活方式的深刻变迁。从根本上说，农家经济这种变迁的本质是由传统封闭型的自然经济逐渐迈向近代开放型的市场经济，此亦即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经济近代化转型的内核所在。

^①吴尊仁：《广西特产物品志略》，民国二十六年（1937），第51、52页。

倘若进一步放眼近代前后的广西，不难发现，近代广东商人推动游贩地区农家经济变迁具有普遍意义。因此之故，借助近代广东商人推进苍梧戎圩周边地区农家经济变迁的典型个案，我们还可以清晰地观察到以下事实：

一方面，借助贯通两广的西江航运，广东商人向广西城乡地区发起了持续数百年的“西进运动”，他们以商人会馆为基点，建立起地跨两广的商业网络，源源不断地将珠江三角洲的商品、资金、信息、技术输向地广人稀、发展相对滞后的广西地区，又从物产丰富的广西贩回物美价廉的农副土特产品将之销往广东乃至海外市场。由此亦知，以文化上的同源性、地缘上的同构性、经济上的互补性为基础的岭南贸易体系在近代时期已初具规模。在这个贸易体系中，广东商人无疑是左右近代广西商业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而广东商人的主导地位决定了岭南贸易体系内广东

占据核心主导地位，而广西处于依附边缘地位的不平等贸易交往格局。近代前后形成的广西“无东不成市”的商业发展格局正是这种核心一边缘交往格局的有力证据。虽然如此，近代以珠江三角洲为主体的、发展水平较高的广东商品经济仍能较好地以广东商人为载体、以西江航运为杠杆，向广西梯度式地辐射扩散，成为推动广西城乡社会经济近代化的“外部力量”。由此看来，今天广东率先提出建立一个包括广东、广西、香港、澳门、海南、云南、贵州、四川、湖南、江西等省区在内的泛珠三角经济合作区域，实际上是18世纪以来岭南贸易体系在当代的发展扩大。此外，历史还告诉今人，近代前后广西经济社会的发展基本上是一种依赖广东辐射推动的依附型发展模式。因此，地处边疆民族地区的广西要想获得更好、更快的发展，在决策上选择主动融入泛珠三角经济合作，自觉承接广东的产业转移以促进自身经济社会转型的战略至关重要。

另一方面，在传统社会里，包括广西在内的边疆民族地区往往被统治者视为“蛮夷化外之域”，政治上的高压、经济上的轻视使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演进举步维艰。因此，边疆民族地区往往是全国经济最落后的地区之一。近代广东商人的贸易活动打破地处边陲的广西原有的孤立闭塞状态，密切了广西边疆地区与国内外的经济交往，促进了广西边疆地区经济开发。历史表明：由于严重缺乏国家力量强有力的支持，以商人为主导的民间力量所起的作用，对于近代落后的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变革意义尤为重要。诚然，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环境已今非昔比，加快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成为国家的优先战略，然而，历史的经验表明，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不能消极被动等待国家政策、资金的扶持，而要积极主动创造有利条件，努力招商引资，致力发展民营经济以加快自身的发展。

[参考文献]

- [1] 饶仁坤，陈仁华. 太平天国在广西调查资料全编[Z]. 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
- [2] 吴承明. 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 [3] 李炳东，弋德华. 广西农业经济史稿[M]. 广西民族出版社，1985.
- [4] 侯建新. 农民、市场与社会变迁——冀中11村透视并与英国乡村比较[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 echo

[发表评论](#)

[查看评论](#)

[加入收藏](#)

[Email给朋友](#)

[打印本文](#)

平均得分 **0**, 共 **0** 人评分

如果你想对该文章评分, 请先[登陆](#), 如果你仍未注册, 请点击[注册链接](#)注册成为本站会员.

1 2 3 4 5 6 7 8 9 10